

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

倪士毅 方如金

杭州(南宋时称临安)自隋朝开始,由于东南经济的逐渐开发,兼以所处的位置在钱塘江下游和大运河的终点,是东南交通的枢纽,因此便成为“珍异所聚”,“商贾并凑”的都市⁽¹⁾。到了唐朝,贸易更盛,为国内外通商口岸,“骈橈二十里,开肆三万室”⁽²⁾,不仅是一个工商业发达的都市,也是一个风景优美的游览胜地。诗人白居易赞美杭州和西湖的诗篇,至今犹脍炙人口。唐末五代,中原烽烟四起,遍地干戈,独吴越国钱氏集团采取保境安民,不事兵革的策略,因此杭州免遭战争的破坏,经济文化得以继续发展。正如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所说:“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乐”⁽³⁾。吴越国又筑捍海塘,整治河道,奖励蚕桑,扩建杭城,对外贸易,也极为发达。到了北宋,杭州已成为“百事繁庶”的“地上天官”了⁽⁴⁾。海外贸易更臻繁荣,又是四大商港之一。北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南下,攻陷北宋首都东京(今开封)。次年,徽、钦二帝被俘,成了金兵的阶下囚,北宋亡。这时钦宗弟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史称南宋。赵构继承了他父兄的衣钵,对金屈辱退让,在金兵的大举进攻下,南宋政权节节败退,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高宗逃到杭州,升其地为临安府,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又正式定为行在所,于是杭州一跃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谓“輦毂驻跸,衣冠纷集,民物阜蕃,尤非昔比”⁽⁵⁾。它不仅是“东南第一州”,而且是全国第一个大都会,即使在当时世界上也是最繁华的大都市之一。

南宋首都 万民辐辏

南宋临安都市经济的繁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于世界前列的地位。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说到杭州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都市。据《咸淳临安志》的记载,南宋咸淳年间临安府的人口,已达到一百二十四万之多⁽⁶⁾,但这个数字是包括临安府所属九县的人口,即依附郭钱塘、仁和二县而言,人口为四十三万二千四十六⁽⁷⁾,已占全府人

(1) 《隋书》卷三十一,《地理志》下。

(2) 李华:《杭州刺史厅壁记》。

(3)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

(4) 陶谷:《清异录》,(《说郭》卷六十一)。

(5) 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西湖》条。

(6)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户口》条记载:“今主客户三十九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口一百二十四万七百六十”。

(7) 《咸淳临安志》卷五十八,《户口》条。

口三分之一左右,可见杭州市区及其附近,人口众多而且又比较集中。南宋临安府户口增长的原因,除了南方地理环境比较优越外,还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

首先,从政治方面来看,由于宋室南渡以后,北方大部分土地为女真贵族所占,因此大批人民不愿受女真统治者的蹂躏,扶老携幼,纷纷南迁。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大理评事莫濂说:“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1〕}。而临安又是全国首都所在地,是北方人民南迁的重点地区。这些南渡的人口中,可分为这样几种人:一种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他们避地南来,大多寄寓城中,也有少数居住乡间的。这批统治集团和剥削阶级,享有各种特权,穷奢极欲,生活极端腐化,对造成临安的虚假繁荣,不无关系。所以当时杭州有“销金锅儿”之称。一种是南宋的军队。因临安是首都所在地,武备不可一日弛阙,单就禁卫军而言,人数已非常可观,而军士之中,又是西北人居多,其次为河北、山东等地人。南渡的将领当中,北人最占优势,如韩世忠延安人,岳飞相州人,刘光世保安军人,吴玠、吴玠兄弟、刘锜德顺军人,张俊秦州人。当时“西北士大夫多在钱塘”^{〔2〕}。一种是社会上有名望的文人学士,南渡的思想家如解州人赵鼎,拱州人许忻,许昌人韩元吉,开封人向沈等。文学家如洛阳人陈与义,济南人辛弃疾、李清照等。名画家如河阳人李唐、李迪,开封人刘宗古等等。他们纷纷南渡,云集杭州,一时人才荟萃,济济一堂。他们的南渡,大大促进了杭州文化事业的空前发展,开导了南宋一代学术文化的先河,同时对杭州都市经济的繁荣也有促进作用。一种是大小商贾。南宋临安是全国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客贩往来,旁午于道,曾无虚日”^{〔3〕}。当时杭州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所以凤凰山又名客山。所寄寓者,大多是江商海贾^{〔4〕},其中有许多也是西北人,他们“辐辏群集,数倍土著”^{〔5〕}。正如陆游所说,“大驾初驻蹕临安,故都及四方士民商贾辐辏”^{〔6〕}。小商贩从东京迁来临安恢复营业的,著名的如鱼羹宋五嫂,东京人,南迁后居钱塘门外,以此为业,曾经高宗宣唤,因此有名,至今杭州“醋溜鱼”一菜,还独擅其美。此外如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杂菜羹李婆婆,南瓦子张家团子之类,都是从汴京迁来的。南渡的人口中,占最大比例的还是农民和手工业者,他们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的大批南渡,对于杭州地区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和都市经济的繁荣,无疑地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虽然处于被统治的地位,但他们辛勤的劳动才是创造了杭州的文明,使南宋临安成为经济繁荣的大都会的主要动力。

另外,因杭州地处东南沿海,物产丰富,气候温和,自然条件优越,经济、文化都比较发达,兼以有湖山之美,风景秀丽,也吸引、招徕了许多外地人的迁入,如邢太尉孝扬,南渡初,寓家湖州的德清驿,因该地湫隘不足容居,于是搬到杭州来^{〔7〕};又如乾道年间沈唯之,因为参观都下热闹的郊祀礼,特地从湖州迁来杭州的荐桥门内居住^{〔8〕}。诸如上述类似的情况,为数也是不少的。

由于临安城内及其附近地区人口的大量增多,这就势必促进了都市经济的繁荣。

〔1〕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五十八。

〔2〕《宋史》卷四三七,《程迥传》。

〔3〕《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4〕《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条。

〔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七十三。

〔6〕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八。

〔7〕〔8〕宋人著《异闻总录》卷四。

农副产品集散市场

南宋临安都市经济的繁荣,一方面是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却是皇室贵族、官僚地主、高利贷者三位一体剥削农村的结果,也就是说封建城市的经济是建筑在对农村的剥削上的,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关于中世纪都市资本的积蓄,……主要似应归因于商业和手工业对于农村的榨取”(1)。毫无例外,南宋临安城市工商业的发达,主要也是靠对农村的榨取,正如朱继芳的《农桑》诗所说:

淡黄竹纸说踟蹰,由纸仍科不嫁租。

努力经营犹恨晚,官司那问有钱无。

……

四月官场入纳时,乡耆旁午上门追。

请看贫妇通宵织,身上曾无挂一丝。(2)

而且它也是建筑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因为江南农业生产的逐渐发展,农产品的销售需要市场,这也就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江南地区的农业,自北宋末年开,由于北方农民不愿受女真贵族的统治,于是纷纷迁往江南,从事土地的开垦,因此耕地面积日渐扩大,对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其次,由于江南一带,水利发达,修治了许多堰闸沟渠,开辟了大片的湖田、圩田、涂田、沙田、梯田等,兼以气候温和,土地肥沃,适宜于农作物的生长。第三是,南宋统治者为了增加税收,供其挥霍滥用,不得不采取一些有利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因此对农业生产也比较重视,如南宋政府对南迁的农民,曾发给他们一些钱米等赈济物资,或租给耕地,或拨出寺院官舍以救济贫乏,以此来安定他们的生活,借以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加上南迁的农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南方农民共同开发江南经济,作出了重大贡献。基于以上几个原因,南宋时江南农业非常发达,尤其是苏、湖、秀、常一带,上田一亩可收五六石,故谚云:“苏湖熟,天下足”(3)。当时江南地区所产的粮食,多数运往杭州,因此杭州就成了东南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所谓“薪南粳北,舳舻相衔”(4)。南宋时杭州粮食的消耗量是很大的,据周密说:“杭城除有米之家,仰余而食凡十六、七万人,人以二升计之,非三四千石不可以支一日之用,而南北外二厢不与焉,客旅之往来,又不与焉。”(5)吴自牧说:“杭州人烟稠密,城内外不下数十万户,百十万口……细民所食,每日城内外不下一二千余石,皆需之铺家。”(6)朱熹也说:“京师(指杭州)月须米十四万五千石”(7),三者记载数字虽不完全相同,但可以看出杭州粮食消耗量是很大的,来杭的粮食大多来自苏、湖、常、秀四州和淮南、江西、湖南、两广等地,但以湖州为最多,所以南宋时杭州北门外有一市镇

(1)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第一篇I《里查图的利润学说》八十七页,1957年三联书店版。

(2) 《南宋群贤小集》《静佳龙吟稿》。

(3)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4) 《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二,《山川一》。

(5) 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上,《杭城食米》。

(6) 《梦粱录》卷十六《米铺》条。

(7) 朱熹:《朱文公文集》卷九四,《李潜墓志铭》。

叫做“湖州市”（即今湖墅），是杭州主要的米市。

除粮食以外，柴炭竹木则来自严州、富阳，“聚于江下，由南门而入”。也有来自婺、衢、徽等州。蔬菜多来自东门外，主要菜市就在崇新门外南北土门及东青门外坝子桥等处，因此当时有“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1〕}的谚语。

此外，由外地来杭销售的各种水果，如福柑、福李、台柑、洞庭桔、衢桔、陈州果儿、密云柿儿、罗浮桔、温柑、樱桃、荔枝、圆眼、密林檎、葡萄等。还有从明、越、温、台等州运来的海鲜鱼蟹鲞腊等类。仅胡椒一项，每日运往杭州食用的就有四十四担之多，每担合二百二十三磅^{〔2〕}，共计有九千八百十二磅，这个数字是十分惊人的。

由于农产品商品化的加强，临安近郊农民有种花为副业的。当时花的品种繁多，有牡丹、芍药、红梅、腊梅、月季、蔷薇、碧蝉、棠棣、佛见笑、聚八仙、百合、滴滴金、石竹、金林檎、水仙、迎春、郁李、桃花、荷花等等不胜枚举，光是菊花有七十多种，不同颜色的榴花就有数十样^{〔3〕}，真可谓花团锦簇，万紫千红。此外，还有从闽、粤运来的茉莉花，为市民所爱好，栽遍杭城，成为风尚。

因为南宋杭州的人口众多，农副产品的需要量自然很大，尤其是粮食和蔬菜。这些农副产品都以杭州为主要市场，这也推动了杭州都市经济的发展。

手 工 作 坊 林 立 坊 巷

封建城市中的手工业经济，有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两种形式。南宋临安手工业的特点，就是私营手工业作坊和小商品生产的增多。除军器之类不准私家生产，以及朝廷的几种官营手工业作坊如少府监、将作监所属的一些作坊外，其余基本上都是商品生产。每一类商品都有专门制造的作坊。经营手工业行业的多寡，这是衡量中世纪城市经济发展程度的标志之一，南宋临安城里从熟食小品到穿着衣服或家内杂物用具都有专门制作的私营手工业作坊，仅《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所记载的就有下列二十二种：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钹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背作、装奁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作。说明了手工业在临安都市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也反映了南宋临安城市经济的发达。以上二十二种手工业作坊所生产的小商品，大部分是人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物品。其中如修香浇烛、打纸、冥器三种作坊，则是专门生产迷信用品的，这是因为杭州居民崇拜佛教，迷信之风特盛的缘故。

此外，周密的《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条也记载了南宋临安各种小商品生产有一百七十多种，其中大部分是手工作坊制造出来的小商品，大部分是自己制造自己出售，这种情况，在南宋的临安是很普遍的，这也充分体现了南宋临安的都市经济是中世纪的封建城市经济。例如搗槌一项，与杭州人民的生活非常密切，俗谚说：“杭州人一日吃三十丈木头”^{〔4〕}。因为搗槌是用来研磨米麦或其他杂粮的木料，杭州人每日因研磨食物而耗去的木头共长三十丈，

〔1〕 周密：《二老堂杂志》卷四，《临安四门所出》。

〔2〕 《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151（重）章，冯承钧译。

〔3〕 《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

〔4〕 《武林旧事》卷六，《小经纪·搗槌》：“以三十万家为率，大约十家日吃搗槌一分，合而计之，则三十丈矣。”

这虽然不是一个精确的实数,但也反映了这种器具用途重要,且又普遍。

南宋临安较著名的手工作坊,一种是丝织业,除大规模的官营绫锦院以外,私营的手工作坊也很多,这种私营作坊的织造技术,水平很高,能织造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如《梦粱录》里记载说:“锦:内司、街坊以绒背为佳”^{〔1〕},这里街坊指的是私营织造作坊。晁补之在《七述》中也说:“杭故王都,俗上工巧。……衣则纨绫绮縠,罗繡縠绡,轻明柔纤,如玉如肌,竹窗轧轧,寒丝手拨,春风一夜,百花尽发。其制而服也,或袍或襖,或绅或纶,或缘或表,或缝或幘,或紫或纁,或紺或殷”^{〔2〕}。这正是当时丝织业生产盛况的生动写照。从上述这些例子看来,当时临安私营的丝织业是相当发达的。

南宋时,临安城中经营丝绸织物的店铺很多,如市西坊南的刘家、吕家、陈家彩帛铺,市西坊北的纽家彩帛铺,水巷口的徐家绒线铺,清河坊的顾家彩帛铺,三桥街的柴家绒线铺,沿(盐)桥下生帛铺,铁线巷生绢一红铺……^{〔3〕}。这些铺子,除买卖昼夜不绝外,大都兼营织、染等手工业,而且规模也不小,因此当时临安丝织品花色品种繁多,美不胜收。普通丝织品就有绫、罗、锦、纱、绢、绸等。另外,绞丝是用染丝织成的,品种也很多,有织金、闪褐、间道等之分,还有鹿胎、透背之类,都是花纹凸起,具有明显的立体感,而织造式样都是不同的。拿官巷的花作来说,“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前所罕有者悉皆有之”^{〔4〕}。

另一种是印刷业,南宋临安也特别发达。北宋时南方已是造纸业中心,到了南宋,随着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南方的造纸业有了更大的发展。据《武林旧事》卷六《游手》记载:“当时临安奸商为了欺骗顾客,牟取暴利,竟‘卖买物货,以伪易真,至以纸为衣’的情况发生,充分说明了南宋造纸业的进步。当时临安府余杭县由拳村的藤纸,富阳的小井纸,都负有盛名,为人们所珍重。造纸术的发达,为印刷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当时临安印刷业中分官营和私营两种,许多是从开封迁来的。王国维说:‘自古刊板之盛,未有如吾浙者’^{〔5〕}。而两浙印刷术又以杭州最为发达,所以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6〕}。当时官刻的书,较著名的有两浙东路茶盐司本与两浙西路茶盐司本,其次有两浙东路安抚使刻本、浙东庾司刻本等。南渡后国子监南迁至杭州,所以南宋临安国子监的印本最精,号称‘监本’,印刷技术极高。当时临安府拥有大量刊工,绍兴年间(公元1131年—1162年)临安府刊刻《仪礼疏》所使用的刊工多达一百六十人^{〔7〕}。至于私家刻书也很盛行,当时临安书铺林立,称为‘经铺’‘经坊’或称‘经籍铺’‘经书铺’‘文字铺’。单是临安会子库印会子的工人每日就有二百零四人^{〔8〕}。除印刷书籍、会子外,其他尚有印历所,是雕印历书的。南宋临安的书籍铺现在有名可考的有十六处,但其中以棚北睦亲坊南陈宅书籍铺和棚北大街陈解元书籍铺最为有名,前者为陈起所开设,后者为陈起的儿子陈思所开,他们父子刻印了唐、宋人笔记小说和诗文集,约近一百多种,叫做‘书棚本’。由于刻印技术

〔1〕《梦粱录》卷十八《物产》条。

〔2〕晁补之:《七述》。《武林掌故丛编》第十八册。

〔3〕《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4〕《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

〔5〕王国维:《两浙古本考序》。

〔6〕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

〔7〕宿白:《南宋的雕版印刷》见《文物》1962年第1期。

〔8〕《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条。

高明，纸墨工料又多选上等，所以为后世藏书家所宝爱，这就形成了中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宋版书不仅刊印讲究，而且在刊印时都按古写本经过详密的校勘，错误甚少，为研究我国古典文献提供了最可靠的资料。

总之，南宋临安的手工业，一种是从北方迁来的，它在北宋原有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提高。另一种是南渡后才发展起来的。具体表现在部门种类的繁多，分工较细致，同时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也有较大的改进和提高。又如手工业行会的发展，各种行业的“行”和“作坊”的发达，充分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中世纪封建城市经济中私营手工业发展的一般情况。但是，封建城市经济的高度发展，是建筑在对手工业工人残酷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官府也逐步加强了对他们的压榨和“拘占”，这种情况，正如《哀扇工歌》中所揭露的：“某家竹扇名字著，织扇供官困追捕”^{〔1〕}，这正是封建城市中扇工悲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官府的搜刮榨取，严重地挫伤了手工业工人的生产积极性，阻碍了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

茶楼酒肆 商业繁荣

手工业的发展，一方面是商品经济发展推动的结果，但另一方面它又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商业的繁荣。这两者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因此在封建城市经济发展中，除手工业外，商业的发展和商品交换也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指出：“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2〕}。南宋临安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所以城郭广阔，户口繁盛，民居屋宇，接栋连檐，市内拥有作坊、团行、质库、邸店、酒楼、茶坊、勾栏、瓦舍等等，交易非常热闹。临安城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虚空之屋”^{〔3〕}。大街上买卖昼夜不绝，除日市以外，还有夜市和早市。日市结束，夜市又开。夜市除大内前外，其他各处也是如此，以中瓦前为最热闹。“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4〕}。大街上如此，其它坊巷也有夜市扑卖果子糖等物，也有卖卦人盘街叫卖。至于顶盘或担架卖饮食品的，直到三更还不停业^{〔5〕}。酒楼歌馆，则直到四鼓后方才宁静下来^{〔6〕}。临安的夜市还不受季节和气候的影响，寒冬季节“虽大雨雪，也都有夜市盘卖”^{〔7〕}。夜市结束，早市又开，如“御街铺店，闻钟而起，卖早市点心，如煎白肠、羊鹅事件、糕粥、血脏羹、羊血粉羹之类。冬天卖五味肉粥、七宝素粥，夏天卖义粥、馓子、豆子粥。又有浴室门卖面汤者，有浮铺早卖汤药二陈汤，及调气降气并丸剂安养元气者。有卖烧饼、蒸饼、糍糕、雪糕等点心者。以赶早市，直至饭前方罢。及诸行铺席，皆往都处，侵晨行贩。……早市供膳诸色物件甚多，不能尽举。自内后门至观桥下，大街小巷，在在有之，不论晴雨霜

〔1〕 周焯：《清波别志》《哀扇工歌》。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第二十章，《关于商人资本的史的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

〔3〕 《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4〕 〔6〕 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条。

〔5〕 《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

〔7〕 《梦粱录》卷十三，《夜市》条。

雪皆然也”(1)。临安早市供应的点心,花色繁多,四时品味皆又不同,烹调方法既多且精,据《梦粱录》卷十三、十六的记载,单是供应的熟食品就不下一、二百种。(2)特别是和宁门外,因供应禁中需要,“早市买卖,市井最盛”(3)。夜市通宵营业供应,至天晓才散,接着早市开始,买卖昼夜不绝,兴隆异常。

南宋临安饮食业特别发达,无论大街或小巷,城里或城外,到处都有。这是为了适应市民的需要而产生的,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当时临安著名的饮食店就有上百家,有许多私营饮食名家,如杂货场前的甘豆汤,戈家密枣儿,官巷口光家羹,寿慈官前热肉,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涌金门灌肺,中瓦前职家羊饭,猫儿桥魏大刀熟肉,张卖食面店,金子巷口陈花脚面食店,太平坊南倪没门面食店,南瓦子北卓道王卖面店,腰棚前菜面店,朝天门戴家麂肉铺,朱家元子糖蜜糕铺,坝桥榜亭侧朱家馒头铺,石榴园倪家犯鲙铺等(4)。不仅临安城内如此,就是临安附近的小市镇,也因靠近首都所在地,生意兴隆,商贾买卖也十分热闹。

临安城内大街小巷,店铺林立,热闹异常,各种商品都有一定集中的区域,凡同一类的商店,大都集中在一处或数处,称为行或团或市,生产商品达一百七十多种,主要的行、团、市的名称和分布区域,据《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所载如下:

花团	城西	布行	鸡鹅行	横河头
青果团	泥路	药市	炭桥	
柑子团	店市街	花市	官巷	
羹团	浑水闸	珠子市	融和市南坊	
方梳行	销金行	冠子行	官巷	
肉市			修义坊	
鱼行	城北	米市	城北	
蟹行	姜行	菱行	北猪行	城东
南猪行		书房	桔园亭	
菜行	南土门	北土门	生帛	盐桥
鲜鱼行	坝子桥		泉福糖蜜及荔枝圆眼汤等	五间楼

其中如融和坊的珠子市,商品交易非常热闹,买卖动辄都用万贯计算,贵家富室,多住在珠子市附近。自五间楼北到官巷南街,两行多是上等金银钞引交易铺,几百余家,门前陈列金银器皿和现钱,叫做“看垛钱”。有“大质库”(即当铺)十余处,非万贯以上不收当,这种“大质库”又名“长生店”,以高利贷剥削城市平民。杭州的繁荣同交易铺的买卖有一定的关系。特别是彩帛铺(即绸缎店)里交易更是热闹非凡,出售各种软细绫罗绸缎和锦绮缣素。此外候潮门楞木敦场内的柴市,和宁门外的花市,西湖先贤堂、三贤堂、四圣观等处的西湖土宜,也是交易繁盛的地方。由于临安是京师所在地,万物所聚,应有尽有,诸行百市,鳞次栉比,“自和宁门杈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5)。

由于市场商品交换非常发达,为了适应市民阶级的需要,里弄坊巷,设有许多酒楼和茶坊。

(1) 《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条。

(2) 据《梦粱录》卷十三,《天晓诸人出市》、《夜市》、《诸色杂货》;卷十六,《酒肆》、《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等条的统计。

(3) 《梦粱录》卷八,《大内》条。

(4) 《梦粱录》卷十三,《铺席》条。

(5) 《梦粱录》卷十三,《团行》条。

南宋临安的酒肆,大致有两种。一种为官库酒楼,这是为南宋政府创办的酒库所附设的。官酒库共十三所,即东库、西库、南库、北库、中库、南上库、南外库、北外库、西溪库、天宗库、赤山库、崇新库、徐村库。各官酒库都附设有酒楼,其中著名的酒楼,如东库的太和楼、西库的西楼、南库的和乐楼、北库的春风楼、中库的中和楼、南上库的和丰楼、北外库的春融楼。另一种为私人经营的酒楼,有包子酒店、宅子酒店、肥羊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庵酒店、罗酒店等几类。最出名的私营酒楼如中瓦子前的武林园,“店门首彩画欢门,设红绿杈子,绯绿帘幕,贴金红纱梔子灯,装饰厅院廊庑,花木森茂,酒座潇洒”^{〔1〕}。此外如南瓦子的熙春楼,新街巷口的花月楼,融和坊的嘉庆楼、聚景楼,金波桥的风月楼,灵椒巷口的赏新楼,坝头西市坊的双凤楼,下瓦子前的日新楼,都是比较著名的酒楼。白天黑夜顾客盈门,买卖十分兴旺。但是在这些灯红酒绿的酒楼里跑堂的工役杂差的生活却是苦不堪言,他们送酒菜稍迟,食客不满,就要被店主人赶出店堂,随时都有被解雇失业的危险。

茶坊在南宋临安,也很盛行。著名的茶坊如八仙、连二、连三、清乐、珠子、潘家等。还有茶汤巷是茶坊集中的地方,此巷就是因为茶坊多而得名。大茶坊往往张挂名人书画,供茶客欣赏消遣。有的茶坊,除挂名人书画以外,又列花架,插上四时鲜花,或安顿奇杉异松等物于其上,以装点门面,布置得非常清洁雅致,以吸引顾客。茶坊因季节不同而出卖不同茶汤。除清茶以外,如冬季卖七宝擂茶、馓子、葱茶、盐豉汤。盛夏暑天则卖雪泡梅花酒、缩脾饮暑药之类。茶坊中如市西坊南的潘节干、俞七郎茶坊,保佑坊北的朱骷髅茶坊,太平坊的郭四郎茶坊,太平坊北首的张七相干茶坊,这些都是较著名的“花茶坊”。这些花茶坊“楼上专安著妓女”,多是富家子弟、诸司下直等人寻欢作乐会聚消遣的场所,而“非君子驻足之地也”。^{〔2〕}此外如张卖面店隔壁黄尖嘴蹴球茶坊,中瓦内王妈妈家的一窟鬼茶坊,大街车儿茶肆,蒋检阅茶肆等茶坊,凡士大夫聚朋会友,则多在此处^{〔3〕}。

茶坊、酒楼不仅是士大夫聚朋会友之处,同时往往还有说书、评话、讲史、小说、小唱。说书评话艺人根据当时流行的话本故事,用当时的口语,绘声绘色地讲述各种故事,和演唱各种小调。所以茶坊酒肆也是城市劳动人民娱乐、休憩和消遣的场所。

不仅临安内城如此,就是城外郊区也极其繁华,出现了十五个商业繁荣、居民集中的镇市,即“嘉会门(今南星桥一带)外名浙江市,北关门外名北郭市、江涨东市、湖州市、江涨西市、半道红市,西溪谓之西溪市,惠因寺北教场南曰赤山市,江儿头名龙山市,安溪镇前曰安溪市,艮山门外名范浦镇市,汤村(今乔司)曰汤村镇市,临平镇名临平市,城东崇新门外名南土门市,东青门外北土门市”^{〔4〕}。临安郊区的这些镇市,其“南西东北各数十里,人烟生聚,民物阜蕃,市井坊陌,铺席骈盛,数日经行不尽,各可比外路一州郡,足见杭城繁盛矣”^{〔5〕}。

海 外 贸 易 沟 通 中 外

南宋临安为东南交通的枢纽。水道方面,有运河北通苏、湖、常、秀、润、淮诸州。有

〔1〕《梦粱录》卷十六,《酒肆》条。

〔2〕〔3〕《梦粱录》卷十六,《茶肆》条。

〔4〕《梦粱录》卷十三,《两赤县市镇》条。

〔5〕《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条。

钱塘江南通严、婺、衢、徽诸州。钱塘江上游寿昌、龙游之间有梅岭，南宋建都临安府时，此岭最为重要，凡闽、蜀、江西、荆、湖、两广、云南八番以及海外诸国来者，皆经此岭^{〔1〕}，然后顺江而抵临安。海道方面，离临江城东二十五里有澉浦镇，是对外贸易的商港，海面上桅樯林立，船舶云集。由于南宋造船事业的发达，当时大的船舶可以载重五千料（一料等于一石），可载五、六百人；中等的船舶可载一千料至二千料，也可载二、三百人。^{〔2〕}来往于日本、高丽、印度等国。所以《马可·波罗行纪》中说：“其地有船舶甚众，运载种种商货往来印度及其他外国。”^{〔3〕}各国的货物都在这里集散，成为一个拥有数万人口的市镇。

杭州的开港，始于北宋。至南宋时，随着商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进步，海外贸易更加频繁。杭州的市舶务，最早开设在杭州城东南面的保安门（候潮门的北面）外诸家桥之南^{〔4〕}，后来移至城北的梅家桥（今体育场路梅东高桥一带）北面^{〔5〕}。自梅家桥至白洋湖、方家桥直到法物库市舶前，建有“塌房数十所，为屋数千间，专以假赁与市郭间铺席宅舍、及客旅寄藏物货，并动具等物。四面皆水，不惟可避风烛，亦可免偷盗，极为利便。”^{〔6〕}这些“塌房”就是堆栈和仓库。南宋在江南立国，都城临安又地处东南沿海，因此海外贸易有很大的发展，远远超过北宋。市舶司的税收，约占南宋财政总收入的二十分之一，是一项重要的收入。高宗时市舶收入达二百万贯，超过北宋最高额的两倍多。绍兴七年（公元1137年）闰十月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7〕}。又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年）九月上谕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8〕}。南宋在澉浦设有市舶官，管理课税事务。由于南宋政府不断采取奖励措施，对外贸易数量逐年增加。南宋政府采取奖励海外贸易的原因，主要是南渡后偏安江南，半壁河山，版图不及北宋时的三分之二，剥削所入也随之减少。南宋政府一方面为了对付女真贵族的侵扰，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军费开支浩大；另一方面，每年还要向金贡纳数量相当可观的金银和绢帛、茶叶等物，因此，只有通过海外贸易来解决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事实上，由于当时市舶司收入逐年增多，引起了南宋当局对发展海外贸易的严重关注，即所谓“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9〕}。“南渡后，经费困乏，一切倚办海舶”^{〔10〕}。再加上南宋统治当局为了满足其腐朽生活的需要，要进口大量奢侈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药物等。因此南宋统治者积极采取措施，奖励海外贸易。为了奖励外商来中国，凡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货，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的，可以补官^{〔11〕}。当时纲首蔡景芳因从建炎元年（公元1127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招诱贩来货物净利收入高达九十八万余贯之多，因此南宋政府就于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年底授予他“承信郎”的官爵^{〔12〕}。在南宋

〔1〕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九十，《寿昌县梅岭》条。

〔2〕 《梦粱录》卷十二，《江海船舶》条。

〔3〕 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纪》第二卷第151章。

〔4〕 《乾道临安志·仓场库务》。《梦粱录》卷九，《监当诸局条》作“市舶务，在保安门外瓶场河下……又有新务，在梅家桥北”。

〔5〕 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九。

〔6〕 耐得翁：《都城纪胜·坊院》；《梦粱录》卷十九，《塌房》条。

〔7〕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十。

〔8〕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二十四。

〔9〕 《宋史》一八六，《食货志》《互市舶法》。

〔10〕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二〇，《海外诸番》。

〔11〕 《宋史》卷一八五，《食货志》《香》。〔12〕 《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之一九。

统治者的积极推动之下，对外贸易比北宋有显著发展。

由于海外贸易的发达，当时各种番品南货、珍异饰物、奇葩珍卉，源源运至临安。番货中以香药为大宗。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命诸商之以香药至者十取其四。十七年（公元1147年）诏以沉香、豆蔻、龙脑之属，号细香药，十取其一^{〔1〕}。香药的大量输入不仅增加了宋代税收的来源，而且对我国医药学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南宋的临安，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临安都市经济在南宋一代有了巨大的发展，它代表了南宋城市经济发展的水平，说明了城市经济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但是，就整个临安城市经济的基本特征来看，它仍然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中世纪封建消费城市。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亚洲城市的兴旺，或者说得更好些，完全与政府的消费有连带关系”^{〔2〕}。当时临安的情况也是如此，大批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纷纷麇集临安，过着豪华奢侈的寄生生活，加上数十万军队，数以万计的僧道、尼姑、巫卜，以至市井无赖、流氓、妓女，以及大量的闲散流动人口，使这座消费城市的特征更加显著。可是这一派繁华热闹和歌舞升平的帷幕，却遮掩不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辛酸血泪。大批失业的、无家可归的劳动者，他们“长幼啼号，口无饮食，身无衣盖”^{〔3〕}。特别是到了南宋末年，皇帝昏聩，权臣贾似道独揽朝纲，在西湖边的葛岭，依湖山之胜建造豪华堂室和花园，寻欢作乐。政治日趋腐败，经济更形凋敝，临安附近出现了“行都之内，气象萧条”^{〔4〕}的惨象。这正如高斯得的诗句所揭露的：

自从为关以为暴，物价何止相倍蓰。
人生衣食为大命，今已剿绝无余遗。
真珠作襦锦作袴，白玉为饭金为糜。
苍天苍天此何人，遽此大疾谁能医。
无食吾欲食其肉，无衣吾欲寝其皮。
谁能为我覆八溟，一洗世界无疮痍。
丝麻粪土被天下，菽麦水火赈民饥。
风后力牧不可起，吾辈碌碌安能追。^{〔5〕}

物价飞涨，朝廷滥发纸币，饥荒严重，饿殍遍地，使得繁华的临安都市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陷入了经济崩溃的绝境。

〔1〕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

〔2〕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二卷四四八页，三联书店，一九五一年版。

〔3〕 《梦粱录》卷十八，《恤贫济老》条。

〔4〕 《宋史》卷四〇七，《杜范传》。

〔5〕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七，《物贵日甚》。